



刘雄 著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研究

1954年召开的日内瓦会议被认为是西方世界经历的一次重大挫折和灾难。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全盘审查和制定新的亚洲政策。NSC5329号文件出台标志着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形成。该政策的最大特点，是把中国当成了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首要敌人。此外，该文件还提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构想，如「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安排」、「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等。20世纪50年代末，根据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重新修订了亚洲政策，制定了NSC5913/1号文件。

岳麓书社

青年学术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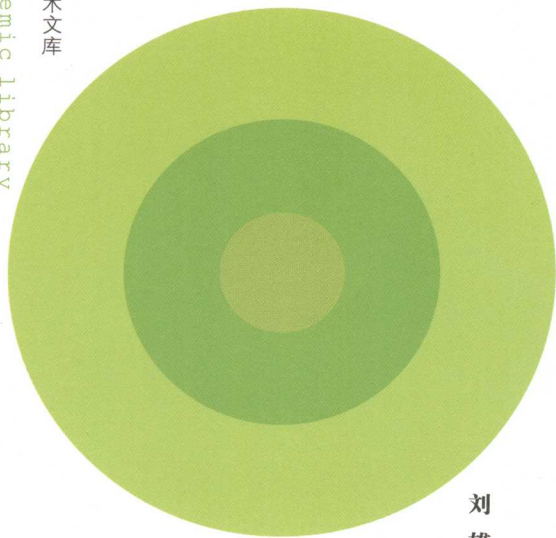
Youth academic library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研究

岳麓书社

刘雄 著

湖南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青年学术文库

Youth academic librar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研究/刘雄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61 - 258 - 2

I. 艾... II. 刘... III. 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亚洲—现代 IV. 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9568 号

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研究

作 者: 刘 雄

责任编辑: 邓 翊

责任校对: 刘海英

封面设计: 肖睿子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 0731—8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网址: 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7.125

ISBN 978 - 7 - 80761 - 258 - 2/G · 750

定价: 18.00 元

承印: 湖南和成彩印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 0731—88884129

序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不仅是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亚洲“冷战”史研究领域的前沿。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陆续解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密档案，以此为契机，国际学术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建立在崭新的史料基础之上。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当然应该积极追踪这批新史料，密切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动向，努力提出自己的学术见解乃至学术体系。

本书的作者，从攻读硕士学位到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领域都是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来的。作为当年的指导教师，我只想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基本特点，以供读者参考。

第一，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大体上说来，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全球性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区域性政策、双边关系中的国别（地区）政策。从研究视野上看，本书立足于中观研究，全面审视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亚洲政策。目前，学术界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国别（地区）政策的研究正向纵深发展，研究论著也与日渐增。但从总体上研究这一时期

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学术成果并不多见。本书所论述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的政策，并非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国别（地区）政策的综合与叠加，而是着力揭示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国别（地区）政策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影响，着力揭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亚洲政策与国别（地区）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不仅展示了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基本面貌，而且对深刻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华、对日、对朝鲜半岛、对东南亚政策的演进，均有启迪意义。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将历史学的文献考证方法与国际政治学的决策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重点探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亚洲政策的决策过程和实践过程，注重揭示美国政府各部门围绕亚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展开的角力、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历史经验。就国际关系研究而论，理论与史实的紧密结合合理应是规范的研究途径。但国内学术界由于人为的学科分野，国际政治学者较重理论模式的建构而轻视对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与研究，国际关系史学者则较重历史档案资料的发掘而忽视在理论方面的提升。该书作者在这方面作了勇敢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

第三，在文献资料基础方面，本书作者既注重对美国政府各类解密档案资料的整理，又注重对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解读，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本课题的研究。惟其如此，尽管本书付梓印行时已距学位论文写作相隔六年之久，其间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中仍然有新资料问世，这些新资料，能够使本书的论证过程更加缜密，但并没有改变本书的基本结论，也更加证明了其学术价值。

学术研究的意义在于探求新知。“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而今，英国政府有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各种历史档案已经解密，日本外务省有关 1945—1972 年美日关系的历史

档案也已经基本解密，如何利用多国解密档案对“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历史进程展开多维研究，乃是中国学者面临的新课题。我也期待本书作者继续孜孜探索，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政策研究领域取得新的成就。

崔 丕

2009年6月2日

目录

绪论	一、NSC 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决策	001
	二、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006
	三、本课题的研究思路及文献基础	013
第一章	亚洲政策的形成及其特点	018
	第一节 全球战略与亚洲政策	018
	第二节 NSC5429/5 号文件	026
	第三节 亚洲政策的特点	039
第二章	亚洲集体安全政策的演变	046
	第一节 《太平洋公约》	047
	第二节 “西太平洋集体防务安排”构想	054
	第三节 东南亚条约组织	061
第三章	从经济援助到经济合作	075
	第一节 美国与“科伦坡计划”	076
	第二节 “亚洲自由国家经济集团”构想	083
	第三节 从经济援助到经济合作	092

第四章	中美对抗与美国对日、韩政策的调整	099
	第一节 强硬的对华政策	099
	第二节 对日本政策的调整	111
	第三节 对韩国政策的调整	116
第五章	全面卷入东南亚	124
	第一节 东南亚政策的基本纲领	125
	第二节 东南亚华侨问题与遏制政策	135
	第三节 中立主义与美国的选择	145
第六章	重新审查亚洲政策	155
	第一节 国际形势的新变化	155
	第二节 NSC5913/1 号文件	160
	第三节 亚洲国别(地区)政策的再调整	171
	结语	182
	附录	190
	参考文献	211
	后记	220

绪论

一、NSC 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外交决策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英文缩写为 NSC。它是根据 1947 年《国家安全法》而建立的。作为总统办事机构之一,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是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各种军事、内政和国际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向总统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以便于各军事部门及其他政府机构在国家安全领域更加有效地进行合作。^①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一般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等人。^② 国家安全委员会还配有专门的工作班子, 由国家安全顾问领导。不过, 法定成员与工作班子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二者的角色地位及对美国外交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在战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中,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和影响随着各总统决策风格的不同而变化不定。但是, 在制定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时, 国家安全委员会始终是最

① [加] 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58 页。

②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中央情报局局长分别以军事顾问和情报顾问的身份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讨论。有时总统也会根据实际情况, 召集预算局长、财政部长等人列席会议。

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

杜鲁门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并不突出,总统不常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会议。在杜鲁门看来,国家安全委员会仅仅是一个研究、评估政策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场所,而不是一个制定政策的地方,也不是一个协调政策执行的中枢机构。^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各项政策方案和建议大都是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起草的。直到1950年6月,杜鲁门才批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设立一个工作班子,负责协调各项政策建议的起草工作,从而代替国务院的政策设计委员会。

艾森豪威尔受其长期等级森严而又整齐划一的军旅生涯的影响,十分重视决策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在总统竞选期间,艾森豪威尔就曾批评杜鲁门不重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作用,并承诺他一旦当选就会对整个国家安全决策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整顿。选举结束后,艾森豪威尔立刻邀请波士顿银行家罗伯特·卡特勒参加政府,专门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改革事宜。^②在他任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班子规模扩大,其责任和权限也有了明确的界定。国家安全委员会真正成为总统制定和协调国家安全政策的主要工具。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8年中,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每周都召开正式会议。艾森豪威尔出席了总共366次会议中的329次。在他的日程表上,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为了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艾森豪威尔设立了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一职^③。该职位人选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国会认可,因而在协助总统制定政策时拥有更强的独立性。在艾森豪威尔政

① Richard A. Best Jr.,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an Organizational Assessment,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Updated April 21, 2008.

② Anna Nelson, The Top of the Policy Hill: Eisenhower and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Diplomatic History*, Vol. 7, No. 3 (Fall, 1983).

③ 该职位的正式名称后来变更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国家安全顾问。

府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是由罗伯特·卡特勒担任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他负责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班子，组织起草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各种政策文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行会议上，卡特勒是实际主持人。每次开会，一般都是由他介绍本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以及政府各部门在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然后，卡特勒引导与会人员讨论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力求把讨论内容规范在会议议题之内。不过，卡特勒一般不对某项政策发表倾向性意见，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中立的过程管理者。因此，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地位在艾森豪威尔时代并不显赫。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化建设方面，艾森豪威尔的最大动作，是创立了计划委员会（Planning Board）和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s Coordinating Board）这两个附属机构。计划委员会主要由助理部长级官员组成，这些人来自那些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代表权的机构。这些人级别较高，能够随时与他们各自部门的领导沟通，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各自部门的专长来为他们现在的工作服务。^①这种人事安排，足以保证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成效及计划工作的权威性。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的领导下，起草各种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政策文件初稿，然后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政策文件的初稿要充分反映各部门之间的意见分歧。这一点突出反映了艾森豪威尔的决策风格。他从不希望各部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讨论前就私下达成妥协。他宁愿看到各部门首脑在会议上就某个问题争论不休。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掌握尽可能全面的情况，从而作出最合理的决定。因此，计划委员会在起草文件时经常会就某一具体问题，提供几套不同的备选方案，以供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和选择。

① Fred I. Greenstein, Richard H. Immerman, *Effectiv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ing: Recovering the Eisenhower Lega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15, No. 3 (Fall, 2000).

行动协调委员会是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度建设方面的另一创举。如上所述,计划委员会起草的政策文件最终要提交给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如果讨论和修改后的文件获得艾森豪威尔的认可,他就会签字确认,然后交由有关部门遵照执行。然而,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的政策文件是否能够真正贯彻落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基本政策目标的制定与为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具体行动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①。为了保证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艾森豪威尔根据罗伯特·卡特勒的建议成立了行动协调委员会。与计划委员会相类似,行动协调委员会也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有代表权的机构派出高级官员组成。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执行提出具体建议,监督和保证国家安全委员会各项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有时该委员会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一些有助于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指导性文件。每隔一段时间,行动协调委员会都会就某份文件的执行情况提出进程报告(Progress Report),说明这份文件执行得怎么样,有没有达到预定目标。如果文件执行得不好,该委员会还会指出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如果某份文件已执行较长时间,行动协调委员会就会实时判断该文件是否需要修改。该委员会还经常将国别(地区)政策文件与区域^②政策乃至整个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文件相对照,以判断国别(地区)政策是否符合区域政策或国家基本安全政策的原则,国别(地区)政策是否需要作适应性修改。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国家基本安全政策(或区域政策)有所变化时。行动协调委员会还下设有超过40个负责各类事务的部际工作组。这些工作组一般由各部门的事务级官员及

①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al Activities [Jackson Committee], June 30, 195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以下简称 FRUS), 1952-54, Vol. 2, PP. 1854-1855.

② 本书中的“区域”指亚洲、欧洲等较大的地理范围;“地区”指东亚、东南亚、南亚、台湾等较小的地理范围。

专家组成，主要研究美国安全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然后向行动协调委员会提出报告。

按照罗伯特·卡特勒的说法，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构筑起了一座“决策金字塔”^①。在塔的底部，政府各机构从部门角度出发，对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政策建议，并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给计划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各部门内部应进行充分协商，拿出一致意见。然后，来自各部门的政策报告汇总到计划委员会，从而到达“决策金字塔”的中部。计划委员会并不在各部门之间搞妥协，而主要是对各种政策建议进行集中和整理，进而形成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初稿。^② 下一步，决策过程上升到“决策金字塔”的塔顶，即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会议。如前所述，这种会议一般在总统亲自主持下，讨论计划委员会提交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初稿。会议结束后，总统会根据情况作出决定，是否将讨论修改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颁布执行。如果总统作出肯定性的决定，那么决策过程就开始走下行路线，进入执行阶段。首先由行动协调委员会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然后下发给各有关部门予以执行。在此过程中，行动协调委员会负责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同时也会跟踪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执行效果。

纵观整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其规模庞大，体系完备著称，是最为正式的决策咨询机构。^③ 艾

① 原文是“Policy Hill”，或可译成“政策山”。

② 在某些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务院和国防部，也会直接起草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初稿，并通过计划委员会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

③ 不过，艾森豪威尔时代庞杂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也引来了非议。有些人批评该系统过于官僚化，以致扼杀了政府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还指责该系统制造出大量无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却未能在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倾注足够的精力。对艾森豪威尔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评见：U. S. Congress, Senate, 86th and 87th Congress, Committee on Government Operations, Subcommittee on National Policy Machinery, *Organizing for National Security*, 1961, 3 Vols.

森豪威尔政府的大多数外交政策都是经由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和制定出来的。因此,探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离不开对数量庞大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系统梳理。本书正是以当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为基础史料,以美国亚洲政策为个案而展开研究的成果。

二、与本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际学术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这种学派划分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同。“传统学派”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人,艾森豪威尔只是一个爱钓鱼和打高尔夫球的老爷爷。但是,“修正学派”认为艾森豪威尔才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外交决策的真正掌舵者,杜勒斯只不过是按照总统命令行事。“后修正学派”则主张总统及其顾问们在外交决策中所起的作用都应受到重视。二是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总体评价不同。“修正学派”提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外交决不像“传统学派”所说的那样,是在僵硬的意识形态左右下处处以反共和核威慑为中心,而是实行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保证了美国自身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为西欧社会的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后修正学派”则根据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前两者的观点进行修正和综合。他们并不为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作全面辩护,但肯定其基本成就和

重大决策。^①

然而,有关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的研究并不平衡。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欧洲政策的研究较为细致和深入,但在亚洲政策研究方面起步较晚。^②在对杜鲁门政府亚洲政策的研究中,学者们主要关

-
- ① 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政策研究中的学派分野,参见:Vincent P. de Santis, *Eisenhower Revisionism,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38, No. 2 (April, 1976), PP. 190 - 207. Richard H. Immerman, *Eisenhower and Dulles: Who Made the Decision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1, No. 2 (Autumn, 1979), PP. 21 - 38. Walter Williams, Review: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Post Revisionism,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J - PART*, Vol. 2, No. 1 (Jan., 1992), PP. 89 - 94. Stephen Rabe, *Eisenhower Revisionism: A Decade of Scholarship*, in *Diplomatic History*, Vol. 17, No. 1 (Winter 1993), PP. 98 - 100. G. Bischof and S. Ambrose, eds., *Eisenhower: A Centenary Assessment*,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Introduction. 李鍾元《东亚冷战与韩美日关系》第一章第二节,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版。
- ②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此前大约20年内以中美对抗为主要内容的亚洲“冷战”告一段落,遏制苏联重新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首要目标。此后,美国开始逐渐开放上述时段内的有关档案,学者们也开始在解密文献的基础上认真探讨亚洲“冷战”问题。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走在前面。他在1977年发表的《亚洲有“冷战”吗?》一文中正确地注意到了亚洲“冷战”与欧洲“冷战”的区别。参见: Akira Iriye, *Was There A Cold War in Asia?* John Chay ed.,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 of American - East Asia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1977, PP. 3 - 24. 研究亚洲“冷战”问题的早期著作主要有: Norman Graebner, ed.,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m in Asia: The American Response*, Heath, 1977. Akira Iriye, *The Cold War in Asia: A History Introduction*, Prentice - Hall, 1974. Lisle Rose, *Roots of Trage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Asia, 1945 - 1954*, Greenwood Press, 1976.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亚洲“冷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一定的进展。这方面的新著如: Kimie Hara, *Cold War Frontiers in the Asia - Pacific*, Routledge, 2007.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 - 1961*,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John Price, *Canadian Labour, the Cold War and Asia, 1945 - 1955*,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entre for Asia - Pacific Initiatives, 2003. Richard James Aldrich, Gary D. Rawnsley, Ming - Yeh T. Rawnsley, eds., *The Clandestine Cold War in Asia, 1945 - 65: Western Intelligence, Propaganda and Special Operations*, Taylor & Francis, 2000. Steven Lee, *Outposts of Empire: Korea, Vietna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Montreal, 1995.

注亚洲“冷战”的形成问题。^①而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研究,近年来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个案研究上,综合性论著并不多见。

在众多研究成果中,美国对华政策是一个重点,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课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在外交、经济以及军事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中国的国际威望稳步上升。中国不仅迫使美国走到谈判桌前,并在不损害朝鲜根本利益的条件下结束战争,而且还同其他大国一道参加了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如何对付日益强大的新中国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亚洲政策的首要议题。后来的历史证明,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时代,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始终是一种严厉的高压管制政策。在学术界,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强硬的对华政策,有三种解释比较流行。一是认为,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部分人私下承认对华政策应该有灵活性的一面,但是始终没有人敢冒与国会右翼势力关系破裂的危险来公开推行这种政策。另一种解释认为,维持对华强硬政策可以吸引国内注意力,从而为推进美苏关系的缓和获得更大的空间。第三种观点是修正派提出的“楔子战略”命题。戴维·梅耶斯和加迪斯等人认为,杜勒斯是想通过施压而不是讨好中

① 在这个问题上学术界有各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亚洲“冷战”形成于“二战”结束前后,这种看法过多强调了亚洲“冷战”与欧洲“冷战”的关联性,忽视了亚洲“冷战”自身的特点。参见: Marc S. Gallicchio, *The Cold War Begins in Asia: American East Asian Policy and the Fall of the Japanese Empir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标志着亚洲“冷战”的形成。参见: 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这种观点正确地揭示了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在亚洲“冷战”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但它不足以解释亚洲“冷战”的对象究竟是谁。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亚洲“冷战”形成于1949年,美国亚洲遏制战略的对象主要是苏联,但也包括中国。美国方面的标志性文件是NSC48/2。对于NSC48/2号文件的研究参见: John Chay ed., *The Problems and Prospect of American - East Asia Relations*, Westview Press, 1977。Robert Blum, *Drawing the Line: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n Containment Policy in East Asia*, W. W. Norton, 1982。Michael Schaller,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国来促使中苏分裂。^① 有些学者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指出：美国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战略并不是为了分裂中苏联盟，而是因为美国认识到，不论是否与苏联结盟，共产主义中国都是美国的敌人。^②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亚洲其他国家的政策方面，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危机事件或个别有特色的问题，而对局势相对缓和时期的情况缺乏兴趣。比如说在对日政策方面，学者们对美日联盟关系的研究热情持久不衰。^③ 而在美国对朝鲜半岛政策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朝鲜战争始终是一个中心问题。至于朝鲜停战以后美国对南北朝

-
- ① 关于对华强硬政策的解释参见：Nancy Bernkopf Tucker,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s’ Policy”, Richard H.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35 - 263. David Mayers, *Cracking the Monolith*,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42 - 148. [美] 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 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出自袁明、[美] 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47 ~ 287 页。
- ② Appu Kuttan Soman, *an Unequal Fight? Nuclear Diplomacy toward the Non - Nucle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50 - 1958*, Dissertation, Vanderbilt University, 1995.
- ③ 近年来新出版的著作有很多，例如：Chizuru Saeki, Matthew (FRW) Young, *U. S. Cultural Propaganda in Cold War Japan: Promoting Democracy 1948 - 1960*, Edwin Mellen Press, 2007. Mire Koikari, *Pedagogy of Democracy: Feminism and the Cold War in the U. S. Occupation of Japa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Ellis S. Krauss, T. J. Pempel, *Beyond Bilateralism: U. S. - 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 - Pacif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akeshi Matsuda, *Soft Power and Its Perils: U. S. Cultural Policy in Early Postwar Japan and Permanent Dependenc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Yusuke Torii, *Swing Ideology and Its Cold War Discontents in United States - Japan Relations, 1944 - 1968*,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2007. Eiji Takemae, Robert Ricketts, Sebastian Swann, John W. Dower,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and Its Legacy*,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3. William T. Tow, *Asia - Pacific Security: US, Australia and Japan and the New Security Triangle*, Routledge, 2007. John Swenson - Wright, *Unequal Allies? United States Security and Alliance Policy Toward Japan, 1945 - 196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